■基本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

——简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周为民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有一些论断，都对，但都还只是从不同方面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而在一般的、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或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

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当代乃至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出发，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又指明了这个理论的研究目的和任务，或者说它所达到的理论目的和所完成的理论任务，从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本质的规定和意义。

中国当代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一是怎样实现这种现代化。实际上，争取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根本问题。直至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前，百数十年中一代代中国人为此提出过很多主张、办法和理论作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不少方案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合理性，而最重要的两个解决方案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两个方案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次革命即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们对于在当代中国解决现代化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思想资源价值。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在国际国内全新的时代条件下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则需要找到一条新的道路，需要新的理论。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理论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全新的理论，同时也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这里的关系也是既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对理解中国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研究目的和任务就是科学阐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

目标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并科学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包括由在空间上并存的多方面目标、在时间上继起的多阶段目标形成的体系结构），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现代化目标的认识。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已不仅仅是过去所说的那“四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统领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由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直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条件问题是怎样实现以此为目标的现代化。由邓小平创立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对基本国情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到对发展的动力、战略、方式、步骤的全新认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系列当代成果，全面回答了中国现代化条件的问题，即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实际上，所谓道路问题就是目标与条件的问题。“道路”这个日常用语在这里是多少带有比喻性的一种说法，而它被赋予的实质含义就是“目标与条件”。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这条道路的理论表现，其实质就是说，这个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而这正是这个理论最根本的意义。

这样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能要解答两个疑问。

一个可能的疑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对“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吗？这“四个基本问题”不就是这个理论的研究对象吗？回答这“四个基本问题”不就是它的研究目的和任务吗？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回答了这些问题的，即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基本问题。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解决这些问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这是我们中国人百数十年来一切挣扎奋斗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我们之所以要马克思主义，要社会主义，要共产党的领导，要科学发展，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的目的而没有什么其他目的。因此，“四个基本问题”及对它们的回答，当然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应部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及任务。但就整个理论来说，其总对象、总目的、总任务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是要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的问题。这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心问题，笼罩一切问题的最大问题。正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破除苏联模式而赋予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都是为这个总目的总任务服务的。离开这个目的和任务去谈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个可能的疑问是，这样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窄化了它的意义？是否意味着在实现了现代化目标以后，这个理论就失去意义了？中国“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难道不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对这一类疑问，我们应从以下三点来看。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大理论，其最大意义都在于回答它由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基本问题，根本问题）。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中心问题，着眼于此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才是抓住根本的，因而才能彻底地认识并掌握这个理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第二，之所以有这个疑问，可能主要是因为对现代化作了比较狭窄的理解。应当看到，到本世纪中叶的现代化目标只是初步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束。相应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至少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虽然强调这一点已近20年），为什么？着眼点仍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尤为重要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是一个流动的目标，而不同于规定了某个数值的固定目标。以所谓“后现代”一词来说，这只是相对于工业化社会而言的。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同意的那样，现代化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信息化相对于工业化，即是一种再现代化，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也将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再次现代化或新一轮现代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应当超越对现代化的狭窄理解，而不应以为按工业化标准达到发达水平就是现代化的结束。这样来认识问题，我们就更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新定位所具有的深刻性和思想高度，也更可以看出它所阐明的中国现代化条件的长久适用性。

第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丝毫没有忽视这个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成果。这里的关系是这样的：正是由于紧扣中国现代化问题，从这个根本问题出发，系统研究并正确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才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这就是说，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形成并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科学理论。因此，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无疑是长久适用的，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当然会继续适用于、发展于中国未来长远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之中。但尽管如此，它首要的和根本的意义，也是我们最关心最需要的意义，仍在于它在当代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这样来看，上述定义应是恰当的。提出这个问题有什么现实性和针对性呢？主要也有三点。其一，只有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和根本任务，我们才有可能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真正坚持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摆脱那种从根本上脱离实际的空谈和无谓的争论；其二，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能以深厚的历史感，以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来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来理解并担当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执政使命；其三，这样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意义，更有助于清楚地表明这个理论是中国近代以来基本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表明它所代表的事业是百数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无数志士仁人争取中国富强的事业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从而更有助于让这个理论在全民族、在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最大化地增强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思想史研究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之魂（四）

□侯且岸

（五）求真求实，原始察终

历史研究之美在于求真求实。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虽仅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无需讳言，在现实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宣传中，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回避，有些事实会被人为地歪曲，有些事实甚至会被人为地篡改，从而极大地危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是一种有责任的、公共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不应抱有任何偏见，既不能“因人立言”，也不能“因人废言”。它要求研究者正本清源，原始察终。它也要求研究者一定要出于良知，排除干扰，努力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需要予以还原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我在这里仅述一个显例，即“问题与主义论战”。

今天，透过上世纪50—60年代的激情批判，我所想到的最迫切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努力回到历史的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因此，我详细地研读了那份只出到第37期的《每周评论》。它真实地记载了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读后的心情自然是格外沉重的。着实令人感到惊异的恐怕是历史的批判者根本就没有对这份杂志有起码的尊重，他们并没有完整而准确地研读历史文献，就异常急切地抛出了毫无根据的政治结论。

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是当时一份进步的政治刊物，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在保守派眼中的“过激派”）人物之手，栏目包括“国内外大事述评” “社论” “文艺时评” “随感录” “新文艺” “国内劳动状况” “通信” “评论之评论” “读者言论” “新刊批评” “选论”等，其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第28期）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31期） 《三论问题与主义》（第36期） 《四论问题与主义》（第37期）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第35期），知非（即蓝公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逝世）的《问题与主义》。

胡适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他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做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胡适在文章中的确重点剖析了“主义” 但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倒是抨击了“王揖唐的社会主义” 他说，近来北京的很多报纸，甚至于日文报纸，“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在我想来，这确是一个反面的“教训” 他告诫时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 胡适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空谈主义”一直存有一种特有的、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

我注意到，胡适力倡建立科学的思想范式，不要盲目地迷信“抽象名词” 要从事实出发，努力去思考现实中的问题。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他特意从人的思维过程入手，列举了“清谈” “空谈”乃至“高谈”的不良思想现象，并将这种种现象归咎于“畏难求易”。针对于此，他专门阐释了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救方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念书手。

胡适非常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本意，所以特别说明：请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胡适很重视李大钊和知非的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在《三论问题与主义》的开篇，胡适写道：“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胡适甚至说，蓝君与李君的观点与“他并没有冲突”。在《每周评论》第33期，胡适主动转登了蓝知非与他商榷的文章，并且专门加了按语，特别说明知非已将自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转载在《国民公报》上，而“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匡正我的原作”。我想，恐怕只有五四时代的学人才会有如此的气度，毕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如今，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用“两军对垒”的思维去看待一切，也就很难理解那时的学风了。

在上世纪的30年代，胡适对当年的讨论曾做过深刻的反思，但却表示不改初衷。他依然自信自己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抽象名词的迷信。

■新时期论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

□袁秉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伴随着和平发展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实践的推进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它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在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国家精神和核心价值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强大软实力。我们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千万不可疏忽国家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并重：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 首次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此后，党中央和学术界多视角、宽领域、高层次研究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课题，锲而不舍地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理论研究、战略定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和表述也随之不断深化和完善。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定位：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保证，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改革开放30周年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到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的明确规定；从我国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到国家综合国力软实力的提升和增强。我们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提升。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构成：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不断奋进的伟大旗帜，是统一人民意志和行动的科学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团结奋斗的目标追求和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凸显当代中国人高昂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荣辱观，彰显了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积淀的高尚道德境界。在精神层面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经验和规律性认识。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实践：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到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从道德建设、志愿服务，到弘扬精神、人文关怀；从社会氛围、文化环境的优化，到身心和谐、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认识和实践举措正在达到新的境界。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契合：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相互契合，在精神层面上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爱国主义熔铸特定时空下的精神豪情。爱国主义历来具有特定的时空内涵，体现特殊的胸怀和豪情。发扬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贯经验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思想体现为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高度统一。1981年邓小平针对有人说的“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的错误言论，严肃地指出 “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其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它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2.革命精神是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要弘扬“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邓小平所说，“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3.创业精神为开创新局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世纪之交，由于苏联东欧等国出现亡党亡国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跌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993年3月，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64字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一新时期创业精神，为开创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4.民族精神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核心。在新世纪，胡锦涛依据具有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积淀和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进一步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这一科学阐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核心。

精神动力、精神支柱关系到民族盛衰、国家兴亡。中华民族历来是自觉追求高尚精神、注重精神修养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国民的精神塑造和国家精神建设。十二五规划《建议》凸显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契合，有利于在精神层面上卓有成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